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丛书主编◎周大鸣

财富与他者

一个古镇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

Market Exchange and Ethnic Relation in a Town of South China

Wealth and the Others:

吕俊彪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SSAP)

·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

财富与他者

——一个古镇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

著 者 / 吕俊彪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胡 涛

责任校对 / 张德玉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0.4

字 数 / 316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980 - 1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富与他者：一个古镇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吕俊彪

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0980 - 1

I. 财… II. 吕… III. 商品交换 - 影响 - 农村 - 社会关系 - 研究 - 中国 IV. F723.82 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5905 号

本研究为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

资助课题成果

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广西南宁市以西四十公里的扬美古镇是当地有名的繁华商埠，为左江中下游地区农副产品和工业制品的主要集散地。1922年农历四月初九，这座主要由平话人（汉族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城镇，遭到了来自周边地区“七十二条村”的壮族人的洗劫，自此衰落。

本书的研究，基于著者对于扬美古镇及其周边壮族村寨社会生活为期一年多的田野调查。通过比照各类文本的记载以及当地人的口述资料，本书对发生在1922年的“四月初九”事件进行了描述。著者以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扬美古镇的市场体系及商品交换，并对扬美人及其周边村寨壮族人的生计方式、族群认同、财富观念以及社会整合模式等进行了比较，试图通过对导致“四月初九”事件发生的社会文化原因的分析，探讨中国乡土社会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问题。

著者认为，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由于地方政权的更迭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四月初九”事件的发生，却主要源于扬美人与当地壮族人财富观念的差异。在扬美古镇从军事据点到商埠再到村落的历史进程中，想象的祖籍、历史记忆、自然资源状况以及当地人特殊的谋生方式，促成了扬美社会内部多重向度的族群认同以及社会结构上的某种异质性，从而

奠定了扬美古镇商品交换的社会基础，并由此构建了扬美人“独善其身”的财富观念。与此同时，大致相同的经济生活和历史遭遇、紧密的亲属关系网络以及分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结构，催生了扬美周边村寨壮族人“有福同享”的财富观念，使其难以接纳以谋取现实的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商品交换。“独善其身”的财富观念使得扬美人更为注重商品交换的物质利益，而这种价值取向与喜欢“有福同享”的壮族人格格不入。从某种意义上讲，“四月初九”事件的发生，正是这两种不同财富观念冲突的结果。

本书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商品交换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物的交换，而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经济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固然有着物质利益的现实需求，但同时也嵌合着诸多非经济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交易者对于商品交换的不同期待。而在客观文化特征逐渐趋同、族群认同面临表述危机之时，不同的生计取向和财富观念，甚至会成为区隔族群、建构自我与他者的重要工具。

目 录

导 论	1
一 商品交换：物的交换，抑或关系的 缔结？	5
二 商品交换研究的理论脉络与 研究回顾	9
三 研究主题与研究意义	38
四 研究方法田野工作	41
 第一章 财富之祸：扬美古镇的 “四月初九”事件	52
一 扬美古镇	52
二 “四月初九”：事件及叙述	66
 第二章 “富贵人家”：“名门之后”的 想象与现实	86
一 “名门之后”	87
二 地缘与业缘	105
三 社会组织	109
四 生活习俗	114
五 婚姻与家庭	121

六 想象的共同体与共同体的想象	125
第三章 壮族人：财富的他者	129
一 村落与墟场	130
二 想象的祖籍	135
三 “村佬”的社会	139
四 “他者”的自我建构	159
第四章 财富记忆：扬美古镇的墟市与 商品交换	163
一 市场体系	166
二 扬美墟市	167
三 墟市贸易与当地社会	191
第五章 财富之道：生计与族群区隔	204
一 牛与人	205
二 “■餐食餐”	211
三 “耕田种地”	226
四 生计取向与族群区隔的形成	232
第六章 财富的观念图式：人、神、财	238
一 独善其身的扬美人	240
二 财神与谷神	242
三 财富的想象：“水”与酒	258
四 财富的交换逻辑	267
五 富裕的“慳嗇”与贫困的 “慷慨”	275

第七章 财富的维度：族群认同与	
社会整合	282
一 族群认同	284
二 互酬与壮族社会的整合	304
三 商品交换与扬美社会的整合	313
第八章 财富、交换与族群关系	322
一 商品交换的社会实在性	323
二 商品交换的“理性”与财富观念	
图式	331
三 “差序格局”、“兄弟情谊”与	
商品交换	343
四 乡土社会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	355
结 论	362
一 商品交换与族群认同	362
二 财富的观念图式与族群关系	366
三 社会整合模式与商品交换	370
四 乡土社会的商品交换：一种	
总体性的经济交往方式	372
参考文献	374
后 记	395

导 论

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总是被“嵌合”（embedded）在社会之中。

——卡尔·波朗尼（Karl Polanyi）

我认为一个社会的再生产需要三项原则和三个基础的组合方可实现。那就是必须馈赠一些东西，出售或交换一些，再就是总保留一些。

——莫利斯·戈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

1922年农历四月初九，在广西南宁市郊区，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群体事件。事件发生在南宁市郊约四十公里的扬美古镇。^①这座在清末民初兴盛一时的繁华商埠，遭到了来自邻近地区“七十二条村”^②的壮族人的洗劫，据说有四五千人之众。一些经历过

① 1922年以后，扬美镇商业萧条、人口大量外流，渐成“扬美村”。1949年后相继成立的“合作社”、“大队”、“村公所”、“村民委员会”等，均是行政村建制。如今的扬美古镇是1999年以后出于旅游开发的需要，由当地政府“打造”的“旅游招牌”。在本书中所出现的扬美镇、扬美村（不包括平凤坡）、扬美古镇均为同一所指。

② 当地人对于参与事件的壮族村民所在村寨的笼统说法。

这一事件的扬美老人说，当时那些从邻村过来的人，“见钱就抢、见人就拉（抓）”，不但劫财劫色，还杀人放火，好端端一个扬美镇，一两日之间便成了废墟。当时的扬美街上，“尸骸狼籍（藉），血肉横飞”，其惨状不堪回首……

我对这起事件的最初了解，颇有些“道听途说”的味道。^① 2005年9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也就是我到扬美古镇进行田野工作的第三天傍晚，因为房东家的晚饭还没有做好，我到古镇上一个被称为“金马广场”的地方，漫无目的地闲走。这时广场边上一位卖芭蕉的老年妇女招呼我买她的芭蕉，说她的芭蕉是西贡蕉^②，不同于一般的香蕉，很“好食”（好吃），而且价格很“平”（便宜）。^③ 尽管美味的芭蕉并不能挑起我的食欲，但我感到这或许是一个接触当地人的好机会，于是便买下了她箩筐里所剩不多的芭蕉，然后开始和她攀谈。老人家说她今年七十几岁了，不能干太多的活，但也不能总在家里闲着，于是平日里就贩一些香蕉、芭蕉或其他水果到街上来卖，当地人把这一类的活计称作“走街”或“赶街”。老人说，她每天这样的“走街”，一来可以养活自己，不用儿女担忧；二来可以有些事情做，心里也踏实。她说她的父亲以前是做生意的，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着“走街”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政府）讲不能搞“投机倒把”，生意不能明着做，她就只好偷偷做。因为那时生产队里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家里的口粮”。老人接着说，以前这里的人很有钱，家家户户都有人做生意，当时的扬美街很热闹，来往的货船也很多。末了，

①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在扬美古镇生活时间稍长的人来说，大都可以从当地人那里听到有关这起事件的一些传说。

② 西贡蕉，当地的一个芭蕉品种，据说是从越南的西贡市（今胡志明市）引进，故名之。

③ 扬美人平素讲平话，但与外地人交流时则主要讲当地的粤语方言。此处“好食”、“平”等词，均为当地粤语方言的习惯用法。

老人家很神秘地问我是否听说过壬戌年（1922年）“四月初九”的事，我说没有。于是老人便说，那年农历的四月初九，邻近“七十二条村”的（壮族）人到这里来“Dum”（洗劫）我们扬美，见人就斩（砍），见有好东西就抢，拿不走的就烧，什么都烧完，好惨的！“七十二条村啊！多少人你知道吗？记者？！”^①老人说，“少说也有四五千人啊！这件事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我阿妈跟我说，那真是好惨咯！那些邻村的人自己不会做生意，却眼红我们扬美人有钱，就过来抢。但是那些被他们抢去的钱，也不见得有什么用，你看如今我们的生活还不是照样比他们好过（过得好）！”老人最后说他们（父辈）的钱，不偷不抢，都是靠做生意得来的，光明正大，没想到却受到这样的“害”（祸害）。

老人的话，使我感到几分沉重，同时也使我陷入思索之中。根据之前掌握的一些资料，位于北回归线南侧的南宁市郊区农村，“平地尽良田”，“丘陵皆沃土”，且气候温暖（年平均气温21.6℃左右），雨量充足（年均降雨量1304.2毫米），终年适宜植物生长。^②当地的稻谷一年可以两熟，物产丰富，人口密度不高，即使到了1990年，其人口密度也仅为每平方公里298人，^③人地关系似乎并不十分紧张。自宋皇祐四年（1052年）中央王朝出兵平定侬智高、宋熙宁八年（1075年）交趾国（今越南）辅国太尉李常杰兵破邕州城之后直至民国初年，南宁一带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当时的民族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还比较平稳。与此同时，当地的自然灾害也相对较少。据记载，自宋景德四年（1007年）至1990年，南宁市有记载的水灾共有60次，平均16.4年一

① 在田野工作的早期，当地人不甚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很多人都把我当成记者。

② 参见南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宁市志》（综合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3页。

③ 南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宁市志》（综合卷），第248页。

次，而旱灾自南齐永元元年（499年）至1990年，有记载的共有52次，平均28.7年一次。^①在这样一个气候相对适宜、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民族关系相对融洽而又没有频仍的自然灾害的大背景之下，为什么会出现“四月初九”这样的惨剧？为什么这样的惨剧会发生在扬美而不是南宁市郊的其他地方？为什么壮族人能够动员“七十二条村”的人？为什么壮族人不仅劫财、劫色而且还要杀人放火？为什么当时的政府会坐视不管……

当地人对于此事发生原由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在一些扬美人看来，那场发生在距离广西首府不过数十公里之遥的人间惨剧，虽然不无一些人“趁机搏乱”的成分，^②但从邻村人所体现出来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看，此一事件显然不是一时的冲动所致。据一些扬美老人说，当时的扬美人家很有钱，“四月初九”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因为邻村的壮族人眼红他们有钱。而扬美邻村的一些壮族人则认为，“四月初九”事件的主要起因，是由于当时扬美镇上的一些人做生意不厚道，而且常常欺负邻村的农民，当地人因此对扬美人积怨甚深……尽管关于事件的起因各方说法不一，但无论是扬美人还是扬美周边村寨的壮族人，都比较认可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四月初九”事件，因“买卖”（商品交换）而起。

此后不断深入的田野调查，也使我相信，“四月初九”事件的发生，确实与扬美古镇的商品交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我也在揣测，这样一种联系，是否只是一种表面性的社会事实？果

① 南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宁市志》（综合卷），第219~225页。

② 当时适逢陈炯明粤军撤出广西，广西各地“自治军”纷纷成立，时势比较混乱。一些官方的出版物认为，“四月初九”事件的发生，乃是源于反动势力对革命事业的仇恨，因为当时有扬美人梁烈亚跟随孙中山从事所谓的革命工作。参见梁烈亚《改选广西同志会的成立及其斗争》，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4，第191页。

真如此，则其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又是什么？

一 商品交换：物的交换，抑或关系的缔结？

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本来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由于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而成为一种“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马克思把人们对于商品的这种幻觉称为拜物教。^① 马克思认为，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首先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持有的社会性质，即商品交换使商品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这是一种“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②

人类学者一直尝试着解开各种掩盖在交换关系之上的“物的外壳”。自布劳尼斯拉维·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马赛尔·莫斯（Marcel Mauss）以来，交换问题就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只是，传统人类学之于交换问题的研究，往往聚焦于部落民社会的礼物交换现象，而对于其他社会形态的交换问题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因此，商品交换问题对于人类学的研究而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89页。原文如此：“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90~91页。

言，至今仍然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话题。

在著名的《论馈赠》一书中，莫斯提出了交换方式演变的三个阶段，即“全面给予”阶段、“馈赠”（礼物交换）阶段和商品交换阶段，并认为“馈赠交换经济远不符合所谓的自然经济和功利主义原则”，而“人变成机器，变成复杂而又斤斤计较算计的机器是近代的事”。^①莫斯或许没有估计到他基于部落民社会的礼物交换研究所做出的这一判断对于其后的人类学交换理论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从某种并不严格的意义上讲，莫斯关于交换方式演变的所谓“三阶段论”，几乎框定了人类学交换问题的研究范式。在这种范式之中，礼物交换与古代社会，商品交换与现代社会，总被有意或无意地捆绑在一起。而一些较为极端的看法，更是以这样一种表述方式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礼物交换建立起交易者之间的关系，而商品交换则建立起所交换的客体之间的关系。”^②或许可以这样说，格雷戈里（C. A. Gregory）对于商品以及商品交换的想象，实际上附和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以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商品交换问题上的理论预设。在该学派的理论预设当中，商品常常被视为缺乏社会内容的物品或者物件，只有物质形态或者数学符号上的存在意义。在马歇尔等人看来，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几乎是完全同质的，任何人在市场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力。由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构建了一个非常抽象的、简化的世界”。^③

商品是否只是一种只有客观确定量的物件？商品交换是否只

① [法] 马赛尔·莫斯：《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卢汇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第94页、第139~146页。

② [英] C. A. 格雷戈里：《礼物与商品》，杜杉杉、姚继德、郭锐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44页。

③ 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303页。

是一种物与物的交换？如果不是，它们又承载着怎样的社会关系？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商品的分析，发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生产的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在劳动上的占有与被占有关系，这无疑是商品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然而，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除了反映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劳动关系之外，是否还潜藏着其他的社会关系？

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曾经指出，商品只有在它作为一个整体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遍范畴的时候，其未被曲解的本质才能被理解。^①这主要是因为，商品并不是纯物质的对象，它的使用总是与某种精神状态或社会情境相关联，从而展现着一定的社会意义，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制约。^②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种社会意义以及社会制约又从何而来？

如果说一些主流经济学者把商品交换视为“抽象的、简化的世界”里纯粹意义上的物的交换，其所带来的关于交换问题的诸多理论后果主要源于其理论预设上的武断的话，那么，人类学者在这一问题研究上的缺憾，则主要源于研究对象上的褊狭选择。事实上，在一个自然形成的封闭的社区里，由于物质资源的稀缺状况大致相同，又缺少与外界的交往，因而以“己之所有”换取“己之所无”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相对较少，商品交换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而他们内部偶有的一些商品交换，也总是嵌合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往往难以厘清；而在商品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现代社会当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表面疏远关系，

① 史蒂文·贝斯特：《现实的商品化和商品化的现实：波德里亚、德博尔和后现代理论》，载于〔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64页。

②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对商品分析的文化视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往往容易造成其关系分离的假象，以及作为交换主体的人不断被消解的错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反差极大的社会经验，导致了人类学的交换理论研究与商品交换的社会事实之间的疏离。

如何弥合这种疏离关系，以更好地理解商品交换中那些“被曲解的本质”，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学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著者以为，作为解决此一问题的一种研究进路，除了在理论层面上融合各家之长以外，在操作的层面上，对于商品交换进行总体性而不是极端式的人类学田野考察，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此，超越所谓“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将研究的关注点转移到类似于中国乡土社会这样一种既非“原始社会”，又与“现代社会”有别的“复杂社会”，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种既有别于主要由陌生人组成的所谓“现代社会”，又与“蛮荒的”、“封闭的”、完全由“熟人”组成的部落民社会不同的社会。^① 著者以为，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社会”的商品交换的考察，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类学交换理论研究与社会交换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汉族人的传统社会^②，乃是一种“礼治”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所谓的“礼”来维持。^③ 然

①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的，这种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他的设想里，乡土社会中村与村之间的关系是孤立的、隔绝的，各区域（村落）之间的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因而这种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由于预置了村落之间的这种隔离关系，费孝通关于乡土社会问题的诸多讨论，都主要聚焦于自然村落内部。1964年，施坚雅对于那种把村落作为中国农村基本单位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农民（乡民）社会区域的边界是由他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决定的。本书所指的乡土社会，主要是指基层市场区域内的中国农村社会。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9页；〔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虞和平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0页。

② 费孝通所指的中国乡土社会，更主要的是指传统的汉族人社会。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第49页。

而，在一些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多民族（族群）杂居的所谓“化外之地”，由于“礼”的约束力相对薄弱，其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地的社会秩序又如何维系呢？如果说礼物交换是整合“原始社会”的主要工具，而“现代社会”则主要依靠商品交换来整合，那么在族群关系较为复杂的中国乡土社会里，不同族群之间的社会关系又以何种方式进行整合？

扬美古镇如今依然活跃的商品交换，一如往昔的“习惯做法”，在一种“你情我愿”的氛围之中，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来实现。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只是一种浮现在社会表层之上的经济现象。那么，支撑着这些貌似平和的商品交换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在物的交换的表面之下，又潜藏着怎样的社会关系？这将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 商品交换研究的理论脉络与研究回顾

（一）交换研究的理论溯源

从学理上对人类社会交换问题进行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即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和人类学的方向。由于社会学的交换理论源自一些早期人类学家的思想，因而虽然其研究的侧重点与人类学有所不同，但理论的渊源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而就研究旨趣而言，经济学主要聚焦于商品交换规律的研究，社会学侧重于交换行为与动机的研究，而人类学的研究则更强调交换者观念世界的细致分析。

形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兴盛于17世纪的西欧重商主义思想，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经济学对于商品交换较早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理论围绕商品经济的深化而展开，其过于强调国家干预